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常言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明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五周年，不同的大型紀念活動勢必紛至沓來。敝刊歡迎各界學者惠賜研究論文，探討與抗日戰爭有關的不同歷史課題，以饗讀者。

——編者

「未富先老」是個偽命題

中國正處於老齡化的高潮期，如何應對老齡化趨勢的挑戰是當下一個重大而現實的議題。楊菊華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挑戰與對策思考〉（《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一文分析了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現狀、特點、趨勢以及挑戰，並對該議題進行反思和提出應對思路。文章指出：長期而嚴苛的生育政策的施行加速了人口結構轉變進程，使中國的老齡化進程遠遠快於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造成「未備先老」、「未富先老」。

筆者對文中涉及到的「未富先老」觀點不敢苟同。把「未富先老」視為中國老齡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當下較普遍的看法，在此語境下，當今養老保障制度的極不完善，主要是社

會老化得太快，政府來不及應對所致。筆者認為這說法似是而非：首先，正因為中國快速的老齡化是計劃生育政策干預的結果，所以在應對老齡化問題上政府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政府對此足夠重視，在中國人口尚未老化時，就應該把養老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作為老齡化的後發國家，已有先進國家的經驗可以借鑒，老齡化的到來及應對措施均是能夠、應該和必須先作準備的。實施計生政策時提出的「一個孩子好，政府來養老」應該理解為政府對養老保障作出了承諾，即便這僅是宣傳的口號而算不上承諾，這個口號本身也反映了養老保障早在當年就已經是普遍關注的問題。眼下在老齡化高潮來臨之際，把「先老」作為「未備」和「未富」的原因，未免有為政府失職尋找遁詞之嫌。

更重要的是，中國進入老齡化社會的過程是與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步的。所以，當老齡化來臨之際，無論從社會總財富還是從政府掌控的公共資源來看，中國社會都並不差錢，差的就是投入到社會保障上的錢太少，這一點從社保支出與財政總支出佔比可以看

出。退一步說，就算當下中國還處於「未富」階段，社會保障制度的極不完善同樣不能僅歸因於「未富」，社會福利分配不公才是問題的癥結。在文明國家，社會福利分配若不是全覆蓋，那肯定是向弱勢群體傾斜；而中國則相反，以醫療為例，長期以來，有限資源中的主要部分是用於保障黨政企業事業單位等人員，尤其是其中的高官；而所謂的體制外人員、尤其是廣大農民則基本上處於任其自然的狀態。雖然近期情況有所改善，如不少地方都宣布實現了醫療保障「全覆蓋」，但保障程度不在一個檔次，社會福利分配不公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在應對老齡化問題時，癥結在於政府責任和公平原則的缺失，而不是所謂的「未富先老」。

潘學方 台州

2019.8.15

「以人為中心」需要精細化的詮釋

曾幾何時，「以人為中心」（或者說「民本」）被視為與農耕社會相關連的優秀傳統，並且作為改革開放時期需要和可以秉承的發展宗旨。從現實層面來看，人口紅利確實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撐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成就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底氣。然而，時勢移易，當下中國已然面臨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用〈人口負債與中國經濟增長〉

(《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一文中蘇劍、康健兩位作者的話來說，則是中國已經面臨着人口轉變時需承擔的「人口負債」。所謂「人口負債」，也就是人口轉變超過了人口紅利階段，人口年齡結構因老齡化而不再富有生產性。

該文通過一系列數據分析了人口負債與人口紅利對經濟走勢的影響。作者認為，整體上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將會在技術進步、資本增長等方面產生負面作用，進而拉低未來的經濟增長潛能。在此前提下，作者開出的「藥方」包括鼓勵生育、推遲退休年齡、以教育促進技術進步等，甚至還看似「趕趟」般地提出以人工智能代替部分人口紅利的主張。

應該說，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已經為學界共知，而且作者的針對性建議在理論上也具有可執行性。但是在筆者看來，相關研究或許還應當再往前走一步。以鼓勵生育為例，生育問題在中國社會無疑是牽涉最廣的民生話題之一，就當前的政策來說，「全面二孩」在2016年就已於全國落地，且不少地方也出台了一定的配套支持措施，但是真實的生育率依然不容樂觀。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在於，生育的主觀意願無法獲得提振，光靠外部因素諸如保障女性生育和就業權利（況且落實起來就極其艱難）之類是難以改變的。

質言之，如果說農耕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導致在中國文化中形成了「多子多福」的文化傳統，那麼工業化進程（也包

括執行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已經瓦解了這一傳統的根基，新世紀以來的社會認知反倒是「生不起，養不起，住不起，死不起」。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社會認知與其說是對社會現實的感知，毋寧說是在傳媒等推動下形成的社會鏡像。然而，即便與現實之間興許存在着若干偏差，也無法抵擋這樣的社會認知產生一系列影響深遠的連帶性情緒和行動。

洪長輝 嘉興

2019.9.1

輕闡釋、重細節：朝鮮史研究的可能路徑

一直以來，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下稱「朝鮮」）總是以神秘形象示人。儘管外界了解朝鮮的渠道十分有限，但並不妨礙公眾對它的關注和興趣。涉及朝鮮的新聞時常佔據媒體重要版面，並能在全世界範圍內引發熱烈討論。然而，相比媒體上的朝鮮熱，朝鮮史（北韓史）研究則稍顯冷清。

正如毛升在〈從敵情到學術：英文學界之北韓史研究〉（《二十一世紀》2019年8月號）一文中所指出的，英文學界關於朝鮮史的研究成果遠落後於中國史、蘇聯史，它最初甚至僅是蘇聯史的分支，其研究具有明顯的政治導向作用。與之相似的是，中國大陸對朝鮮的研究也是以中朝同盟關係為出發點。由於朝鮮革命與中國革命之間的密切關係，兩國本應有不少共用的歷史資源。不過，隨着朝鮮在1950年代末開始建立本國的歷史敘述，並強調「革命的主體性」，中朝兩國

的革命史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側重點。直至今日，在一些中朝兩國學者共同參加的學術會議上，還會出現因歷史事件表述而產生的分歧。筆者在朝鮮參加學術會議時也曾被「友善」提醒，不要提及兩國間尚存爭議的「敏感」話題。以上情況的發生，足以證明長期以來中朝兩國學界的研究基本是沿着各自的詮釋體系進行的，彼此間缺乏充分的交流和互動。

毛升所梳理的英文學界研究涵蓋了政治史、外交史、社會史、文化史等領域，並闡明了西方的政治和學術氛圍對於朝鮮史研究的影響，對於拓寬朝鮮史的研究思路極具啟發。正如毛升所述，歷史學者的觀點很容易被其讀到的史料所影響。英文學術界所利用的文獻資料無論在完整度還是相關度上多少都存在局限。就筆者近年所見，基本認同這一觀點。在目前無法輕易獲取朝鮮本國檔案的情況下，中外學界唯有加強相互了解，才能建立對話的基礎，並進一步協作開展多方文獻的對照和解讀。

誠如文章所指出的，中文朝鮮史學界有着自身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意識，英文學界雖然不會輕易對其根基造成衝擊，卻能夠填補中文學界過往的認識盲區。在學術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外學界在朝鮮史領域的對話必將愈來愈頻繁。儘管國家敘事不會完全從歷史研究中剝離，但在當前環境下，從史料出發，重歷史細節的還原、輕政治得失的闡釋，或許是推動朝鮮史研究跨國合作與對話的可行路徑。

趙崧杰 澳門

2019.9.2